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探析*

崔 焜 靳小怡

内容提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现居深圳市的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代际凝聚力,情感关系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而代际联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降低了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

关键词: 农村随迁父母 家庭代际关系 心理福利 代际团结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5》(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显示,截至 2014 年年末,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中国流动人口已达 2.53 亿;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主流,随迁老人的规模不断增长。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由此,实现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随迁父母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4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为 1.37 亿人,占总人口的 10.1%^①。在社会养老制度尚不健全条件下,家庭养老却已经不能满足老人特别是农村随迁老人的养老需求。家庭传统养老功能的延续与维持、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完善与发展、政府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强化等,都亟待动员与整合不同层面的各类社会资源。《社会蓝皮书:201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李培林等,2013)提出,老人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65 岁及以上老人的自杀率呈急剧升高的趋势。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老人的心理问题将更加突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可持续生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编号:13&ZD044)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流动人口对区域社会系统影响的评估和预警技术”(编号:2012BAI32B07-02)的阶段性成果。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维持高水平的心理福利是成功老龄化^①的重要方面 (Freund and Baltes, 1998), 它直接关系到老人的整体生活状况与福利水平。家庭在个人生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代际关系能够调节各种外部风险对个人的影响, 从而减小或放大这些风险对个人福利的影响 (Katz, 2009)。家庭是农村流动人口特别是随迁父母在流入地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 在城市社会对农村随迁父母群体关怀不足的情况下, 家庭代际关系可能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 能为制定促进流动人口家庭代际团结、提高农村随迁父母生活福利的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

已有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他们的精神生活与社会融入状况, 认为农村随迁老人是一个亟需社会关注的群体 (易丹, 2014)。相关研究发现, 农村随迁老人精神生活单调, 闲暇娱乐活动较贫乏, 很少参与社区活动, 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 (姚兆余、王鑫, 2010); 而就社会融入而言, 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面临着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 (宁玉梅, 2013), 政策限制、文化差异、社会资本等被认为是影响农村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 (余昆, 2013)。适应与融入陌生的城市场景与社区生活, 处理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已经成为农村随迁老人面临的重大人生课题 (易丹, 2014)。为数不多的关于农村随迁父母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 (例如靳小怡等, 2015) 发现, 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 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代际团结, 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 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

目前少有研究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和心理福利展开分析, 更未关注到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笔者的前期研究发现, 农村随迁父母迁移的目的通常以照顾年幼的孙子女为主 (靳小怡等, 2015), 这种迁移的选择性决定了这一群体主要是较年轻的老人或尚未进入老年阶段 (60 周岁) 的人, 因此, 就农村随迁者的年龄特征而言, 本文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研究与对农村随迁老人的研究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基于代际团结理论, 本文将聚焦于分析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 探讨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共识、支持与情感关系, 进而探索它们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 代际团结

为了理解老人复杂的家庭代际关系, Bengtson and Schrader (1982) 提出了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团结模型。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 代际团结包含体现亲子互动的 6 个不同维度, 即代际结构 (影响亲子互动程度的因素, 例如地理距离)、联系 (互动活动的类型和频率)、情感 (感情亲近度或紧密性)、共识 (意见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度)、功能 (支持和帮助上的交换) 与规范 (家庭义务的强度) (Bengtson and Schrader, 1982; Roberts et al., 1991)。代际团结理论认为, 团结、凝聚力是家庭亲子关系的核心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1; Silverstein et al., 1996)。尽管近些年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代际关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但团结模型仍被证实是有效的, 被广泛用于

^① “成功老龄化” 理念不仅强调老人健康的重要性, 也认为老人参与生产的意愿、能力与权利应得到尊重与保障, 还强调要重视实现成功老龄化的过程及结果。作为社会现象, 成功老龄化关注老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及生活条件, 这些可以通过其生活方式和心理福利状况来反映 (张旭升、林卡, 2015)。

指导代际关系的研究(例如 Katz, 2009; Lawrence et al., 1992; Lin et al., 2011), 并被成功应用在不同国家的相关研究中。不过, 这一理论在中国代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还很少。

在中国, 孝道规范构成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要素, 而向上流动的支持被认为是践行孝道文化传统的表现, 因此, 典型意义上的代际支持主要涉及单向的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依赖, 传统代际关系表现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张文娟、李树苗, 2005)。目前, 学者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关注往往集中于代际支持, 特别是以向上流动的支持为主, 但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家庭而言, 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家庭照料是农村父母随迁的重要原因(靳小怡等, 2015), 也是随迁父母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有学者认为, 代际情感、代际联系和代际共识是反映家庭凝聚力的核心要素(Bengtson and Schrader, 1982; Roberts and Bengtson, 1990); 也有学者发现, 代际联系、代际情感和代际支持是代际团结概念中高度相关的核心维度(Hogerbrugge and Komter, 2012)。

(二) 代际团结与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

代际团结聚焦于家庭凝聚力, 被视为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心理福利都有重要影响(Rossi and Rossi, 1990)。有研究发现, 代际团结有利于健康老龄化^①和老人的社会融合(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1), 也有助于老人应对压力例如守寡(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4)或迁移(Katz and Lowenstein, 1999), 从而提高其心理福利水平。然而, 代际关系的不同方面对老年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并不一致。依照所关注的代际团结维度的不同, 代际关系对老人的心理福利可能并没有显著作用(Lowenstein et al., 2007), 甚至会造成消极影响(Silverstein et al., 1996)。有研究者建议, 在分析代际关系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前, 应该考虑到代际关系的不同方面(Lee and Ellithorpe, 1982)。

在西方家庭中, 代际联系的频率和类型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精神状态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关注。Edwards and Klemmack (1973) 研究发现, 非正式家庭参与(通过“拜访子女”等涉及代际联系的变量来测量)是社会经济地位、健康、背景特征等6个指标中仅有的与福利无关的主要指标, 而后来的研究很少发现代际联系与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例如 Lawrence et al., 1992; Lowenstein et al., 2007)。然而, Markides and Krause (1985) 发现, 代际联系对老人的心理压力具有正向影响, 但其影响机制尚待进一步分析。对中国家庭代际联系的研究虽少, 但已得出与西方家庭代际联系相关研究不一致的结论, 即与子女的交往会对老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任强、唐启明, 2014)。

代际情感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程度(Roberts et al., 1991)。西方的家庭关系研究对代际情感给予了较多关注, 但是, 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西方已有研究证实, 相对于代际联系而言, 代际情感对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更为重要。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与成年子代和老年亲代这两代人的生活满意度均强烈相关(Lowenstein and Katz, 2005), 且对老年亲代更为重要, 因为老年亲代更看重代际延续性, 而成年子代则强调代际自主权(Giarrusso et al., 1995)。同时, 相比于与子女关系疏离的父母或没有子女的父母, 与子女情感上亲近的父母更幸福、对生活更满意(Connidis and McMullan, 1993)。在中国, 代际情感对老人心理福利影响的相关研究得出了较一致的结论: 与子女较强的情感凝聚力有助于改善老人的福利和生活满意度(Silverstein et al., 2006), 家庭关系越和谐、与主要照料者越亲近, 老人对其生活越满意(Zhang and Yu, 1998)。

^① “健康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社会中,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改善老龄群体的生活和生命质量, 使老人健康幸福地度过晚年。其核心表现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状况良好。

大多数检验代际关系对老人心理福利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代际支持的影响。西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典型模式是从父母流向子女，依赖子女获取社会支持往往会对老人的心理福利产生消极影响（Lee, 1985），从成年子女处获取帮助可能会导致老人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而给子女提供帮助则能增强老人的生活满意度（Lowenstein et al., 2007）。然而，McCamish-Svensson et al.（1999）研究发现，无论是来自子女还是来自朋友的支持，均未显著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除了代际支持方向，代际支持水平也可能对老人的心理福利造成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的适度支持对老人的心理福利有益，而高水平的支持则可能有害（Silverstein et al., 1996）。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强调孝道，成年子女承担着为老人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的主要责任（Gu et al., 1995），因此，大多数相关研究主要从父母作为代际支持接受者的角度来分析，发现从子女处获取支持能使老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Lin et al., 2011），而家庭照料的缺失可能导致老人的心理福利变差（Zhang et al., 1997）。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老人给子女经济支持对老人的健康自评状况有积极影响，而给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则没有显著影响（宋璐等，2006）；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或照顾孩子直接地改善了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Chen and Silverstein, 2000）。

代际共识提供了家庭代际关系认知方面的测量，它主要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在意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态度的一致性 or 相似性（Roberts et al., 1991）。尽管代际共识是代际团结的核心维度之一（Bengtson and Schrader, 1982; Roberts and Bengtson, 1990），但是，关注代际共识对老年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研究还很少，并且主要集中在研究西方家庭。有学者通过构建代际共识、代际联系、代际情感与老人心理压力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代际共识并不直接影响心理压力，而只是通过代际情感间接地降低了老人的心理压力（Lawrence et al., 1992）。另一些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到基于代际情感和代际共识的情感—认知维度（Katz, 2009），发现它是老人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代际情感和代际共识与老人的主观福利及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三）小结

基于上述对家庭代际关系和老年父母心理福利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文发现，尽管代际团结包含多个维度，但是，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代际支持，对代际关系其他方面的关注很少，这不利于全面把握当前城镇化背景下日益复杂多样的家庭代际关系。同时，代际团结与老年父母心理福利的研究多以西方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代际团结理论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父母心理福利关系展开的研究还很少，代际团结理论在研究这一问题上的适用性有待作进一步探究。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及其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研究：首先，在研究家庭代际关系时，不仅关注代际支持，同时基于代际团结理论纳入代际联系、代际情感与代际共识等维度，以多维视角考察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其次，探索代际团结的多个维度对农村随迁父母的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试图描摹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中国模式。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对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抽样调查。P区是深圳市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区，下辖23个社区，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的5.54%。P区是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工业园区，其九成以上的常住人口为农村流动人口。当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农村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成为可能，以照顾年幼孙子女为目的的农村随迁父母所占比例较高。因此，在研究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及随迁父母问题上，P区有程

度较高的代表性。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子女在深圳市务工、户口不在本地且具有农村户籍的父母，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随迁父母”（文中部分地方将其简称“随迁父母”）。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当地随迁父母的年龄跨度较大，对中壮年和老年群体均有所覆盖，本次调查并没有把父母限制为 60 岁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至少有一个子女在深圳市务工的农村随迁父母均是本次调查的对象^①。调查内容包括随迁父母的城市生活状况、家庭代际关系、社会融合状况、心理福利及养老公共服务等。

为了最大限度抽取到 P 区的各类随迁父母样本，本次调查采取了多种抽样方法：首先，在每个社区采取等比例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调查员对随迁父母进行面访问卷调查；其次，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农民工子女就读较多的两所民办幼儿园进行调查，由随迁儿童将问卷带回给农村户籍的祖父母，请祖父母在家自填问卷，完成之后再由随迁儿童带回幼儿园并由调查员集中回收。课题组在调查执行和数据录入的各个环节均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证数据质量：首先，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了培训；其次，在调查过程中对调查员进行了随机跟访，及时纠正调查员处理不当的问题，并针对特殊情况确定处理办法；再次，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审核、更正与复访；最后，进行数据录入质量控制与逻辑检错。对数据质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次调查数据虽然存在一定误差，但均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数据质量较高。（靳小怡等，2015）

本次调查最终获得 292 个合格的农村随迁父母样本。考虑到父母随迁到城市半年左右以后才可能开始适应并处于稳定的城市生活状态（包括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在深圳市的生活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村随迁父母。剔除随迁时长小于半年（50 个）和关键变量数据缺失（60 个）的样本后，本文研究最终获得 182 个有效样本。从样本的基本特征来看（见表 1），女性和 60 岁以下的随迁父母占多数，这可能与随迁父母的随迁目的主要是帮助照看孙子女有关；大部分随迁父母有配偶（占 81.32%），超过一半的随迁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占 54.39%）；随迁父母在过去 12 个月的总收入平均为 22483.46 元，包括其退休金或养老金、子女或亲属给予的财物、其他收入（例如储蓄利息、房租等）；随迁父母的身体健康水平较高，有较好的功能状况^②。给孩子提供经济和家务上的帮助（58.79%）、照顾孙子女（69.78%）、家庭团聚（40.11%）是父母最主要的随迁原因；因身体不好需要子女照顾而随迁的人很少，仅占 14.84%，这反映了样本随迁父母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随迁父母在 P 区的平均生活时间已超过 7 年，居住 5 年及以上的人占 55.49%；大部分随迁父母有长期居留的意愿，打算住几年甚至一直住下去的人所占比例达 76.37%。从全国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的平均时间超过 3 年，居住时间超过 5 年及以上的占 37%，打算在现居住地继续居住 5 年及以上的占 56%（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与全国流动人口相比，深圳市 P 区随迁父母的居住时间更长、居留意愿更高，可能反映了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随迁父母社会融入特征的变化趋势。

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 (N=182)

指标	类别	样本数	比例 (%)	指标	类别	样本数	比例 (%)
性别	男	73	40.11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48	81.32

^①父母只有其中一方随迁时，随迁者即为调查对象；父母双方都随迁时，选取健康状况较好的一方作为调查对象。

^②功能状况反映随迁父母的健康情况，通过基本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量表（参见 Katz et al., 1963）来测量，量表共有 6 个题项：洗澡、穿衣、下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房间内走动、上厕所、吃饭，其选项赋值为：自己根本做不了=0，有点困难=1，没有困难=2。把 6 个题项的总分作为反映功能状况的指标值，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能力越好、功能情况越好。其中，当随迁父母开展上述 6 项活动均“没有困难”时，随迁父母有“较好”的功能状况，否则，随迁父母的功能状况“较差”。本文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661。

(续表 1)

	女	109	59.89	无配偶	34	18.68	
年龄	60 岁以下	104	57.14	功能状况	较好	165	90.66
	60 岁及以上	78	42.86		较差	17	9.34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很少识字	16	8.79	过去 12 个月的收入状况	5000 元及以下	91
小学		83	45.60	5001~20000 元		47	25.82
初中及以上		83	45.60	20001 元及以上		44	24.18
居留意愿	一直住下去	75	41.21	随迁原因 (可多选)	给孩子提供经济和家务上的帮助	107	58.79
	住几年	64	35.16		探亲	24	13.19
	住几个月或一年	14	7.70		照顾怀孕的女儿或儿媳	13	7.14
	其他	29	15.93		身体不好需要子女照顾	27	14.84
随迁时长	5 年以下	81	44.51	为了家庭团聚	73	40.11	
	5 年及以上	101	55.49	照顾孙子女	127	69.78	

注：因四舍五入，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有关比例加总不为 100%。

(二) 变量的测量与描述

1. 因变量：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被广泛应用于测量老人的心理福利状况（例如 Silverstein et al., 2006；宋璐等，2015）。本文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测量同样采用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前者测量心理福利的负向情绪；后者评价个体所感知的当前生活质量状况，是对心理福利的正向测量（Silverstein et al., 2006）。这里分别采用改编的 CES-D（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量表（参见 Radloff, 1977）和 SWLS（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量表（参见 Diener et al., 1985）来测量。虽然这两个量表已经相当成熟，但由于是第一次被应用到随迁父母这一特殊群体，因此，需要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改编的 CES-D 量表共有 9 个题项，将题项 D1、D4 和 D9 的意思表述方向（正面）调整为与其他题项的方向（负面）一致后，对选项赋值为：没有=0，有时=1，经常=2。把各题项的得分加总作为对随迁父母抑郁度的测量，得分越高，表明随迁父母的抑郁度越高。SWLS 量表包含 5 个题项，对选项的赋值为：是=1，不是=0。将 5 个题项的得分加总来测量随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数值越大，说明随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包括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各题项的均值与标准差见表 2。

表 2 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测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N=182)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抑郁度		
CES-D1 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	0.71	0.69
CES-D2 您觉得寂寞（孤单）吗？	0.52	0.58
CES-D3 您觉得心里很难过吗？	0.42	0.58
CES-D4 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吗？	0.84	0.72
CES-D5 您觉得不想吃东西吗？	0.39	0.55
CES-D6 您睡不好觉（失眠）吗？	0.63	0.67

(续表 2)

CES-D7 您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吗?	0.52	0.65
CES-D8 您觉得自己没事可做吗?	0.51	0.65
CES-D9 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有意思的事情)吗?	0.84	0.69
生活满意度		
SWLS1 和大多数人相比, 您的生活比他们要好吗?	0.60	0.49
SWLS2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0.84	0.37
SWLS3 您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吗?	0.87	0.34
SWLS4 这几年是您这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吗?	0.65	0.48
SWLS5 您觉得自己的一生大部分是符合自己愿望的吗?	0.60	0.49

注: 调查结果是基于被调查人将自己的情况与所认识和听说过的人的情况进行总体比较后的主观判断得到的。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上述两个量表的效度。首先, 对量表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结果显示, 对于抑郁度量表, 其 KMO 值为 0.7313,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 ($\chi^2=406.72$, $p<0.001$), 表明抑郁度量表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于生活满意度量表, 其 KMO 值为 0.699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 ($\chi^2=134.21$, $p<0.001$), 表明生活满意度量表数据同样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 运行 Stata 软件后得到因子载荷值(见表 3), 其中, 抑郁度量表的题项 D1、D4、D9 的因子载荷值均低于 0.4, 最终导致抑郁度量表的平均可解释方差偏低。不难发现, 这 3 个题项都是抑郁度量表中的反向题目, 而这些反向题目可能给被访者作答带来困扰, 从而使得这 3 个题项的测量效果不好。由于这些题项对农村随迁父母的适用性有待探讨, 因此,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 将直接把这 3 个题项删除, 以保证量表具有更好的会聚效度。

表 3 量表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和平均可解释方差 (N=182)

	题项数	题项 1	题项 2	题项 3	题项 4	题项 5	题项 6	题项 7	题项 8	题项 9	平均可解释方差
抑郁度	9	0.30	0.61	0.66	0.36	0.57	0.50	0.59	0.55	0.32	0.26
生活满意度	5	0.44	0.72	0.55	0.48	0.43	—	—	—	—	0.29

基于上述分析, 测量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两个指标, 即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 分别包含 6 个题项(表 2 中的 CES-D2、CES-D3、CES-D5、CES-D6、CES-D7、CES-D8)和 5 个题项。通过零阶相关矩阵分析发现, 正如所预期的, 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0.2632$, $p<0.001$)。但是, 较小的相关系数表明, 两者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而不能相互替代, 可以同时被用作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本文所用的抑郁度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736 和 0.6386, 说明量表的信度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同时, 农村随迁父母的抑郁度水平较低(均值为 2.99, 取值范围为 0~12)、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均值为 3.57, 取值范围为 0~5), 反映农村随迁父母具有较好的心理福利状况。

2. 自变量: 家庭代际关系。

(1) 变量测量。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归纳了代际团结各个维度的测量指标。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代际团结维度: 代际联系、代际情感、代际支持和代际共识。参照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给出的代际团结各个维度的描述性定义与指标, 本文对家庭代际关系相关变量的界定和测量如下:

代际联系。代际联系指家庭成员在参与“各类活动”(例如电话交流、见面、家庭聚会等)时进

行代际互动的频率和模式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本文用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各类活动”中的联系频率来测量。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 从不联系=0, 一年几次=1, 一月1次=2, 一月几次=3, 一周1次=4, 一周几次=5, 每天=6。将随迁父母与每个子女的联系频率加总, 得到代际联系的水平。

代际情感。代际情感指两代家庭成员对彼此所持有的积极情感及其程度, 以及对这些情感的相互性体验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本文用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亲近度来测量这一变量, 通过询问随迁父母以下3个问题来获得有关指标及其水平: ①“从各方面考虑, 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上)亲近吗?” 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 不亲近=0, 有点亲近=1, 很亲近=2。②“总的来讲, 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好吗?” 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 不好=0, 还可以=1, 很好=2。③“当您想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 您觉得他愿意听吗?” 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 不愿意=0, 有时愿意=1, 愿意=2。由于情感亲近程度的均值比总量更能够反映代际关系的质量 (王萍、左冬梅, 2007), 本文将随迁父母与所有子女情感互动的平均得分作为代际情感亲近度的水平。得分越高, 表示随迁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越好。

代际支持。代际支持指代际帮助和代际资源交换的程度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本文用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来测量。从父母的角度来看, 包括接受经济支持、接受家务帮助、提供经济支持与提供家务帮助4个方面。其中, 经济支持指自调查时点算起的最近12个月内, 随迁父母从所有子女处获得的以及他们给所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包括现金以及食品或礼物的折现)。家务帮助指自调查时点算起的最近12个月内, 随迁父母从所有子女处获得的以及他们给所有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的频率。其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 很少或没有=0, 每月几次=1, 每周至少一次=2, 每天都做=3。

代际共识。代际共识指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上的一致性程度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本文将其操作化为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同一事件上看法的相似性, 选项及其赋值为: 很不相似=1, 不太相似=2, 一般=3, 比较相似=4, 非常相似=5。将随迁父母与每个子女的看法相似性得分加总, 得到代际共识的水平。

(2) 变量描述。从表4中家庭代际关系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凝聚力。代际联系频率和看法相似性的得分分别为12.09(取值范围为2~28)和8.71(取值范围为1~20), 反映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和共识处于中等水平。情感亲近度的平均得分达到4.94(取值范围为0.50~6), 表明随迁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较好。在代际支持方面, 随迁父母从子女处接受的经济支持较多(平均为7181.14元), 而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较少(平均为2493.12元), 代际经济支持以自下而上(由子女向父母)的流向为主; 而随迁父母给子女的家务帮助相对多一些, 代际家务帮助表现出向下流动的特征。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表现出典型的“向上经济支持和向下家务帮助”的代际互惠互赖的交换模式, 这与靳小怡等(2015)的前期研究发现相一致。这种模式同样出现在中国农村的留守家庭中, 老人为外出务工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和孙子女照看而从子女处获取经济支持(宋璐等, 2006)。这反映了人口流动背景下子女经济地位上升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以往向上支持的代际关系变得更加以交换为主。

3. 控制变量。大量关于老人心理福利的研究发现, 老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是其心理福利重要影响因素 (Pinquart and Sörensen, 2000; Zhang and Yu, 1998; 李越、崔红志, 2014), 这些反映老人资源状况与需求的因素可能会影响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另外, 迁移是家庭生活中的压力事件 (Shuval, 1993), 农村父母随迁至城市可能给其心理福利带来消极影响;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迁父母可能有更好的城市适应状况, 这有利于提升随迁父母的心

理福利。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模型中引入随迁因素（即随迁时长）作为控制变量。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上述各个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N=182)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心理福利					
抑郁度	通过改编的 CES-D 量表计算的抑郁度得分	2.99	2.52	0	12
生活满意度	通过 SWLS 量表计算的生活满意度得分	3.57	1.40	0	5
家庭代际关系					
联系频率	随迁父母与每个子女的联系频率的加总	12.09	4.93	2	28
情感亲密度	随迁父母与所有子女情感互动的平均得分	4.94	1.34	0.50	6
接受经济支持	从所有子女处接受的经济支持量（元），取对数	7.35	2.86	0	11.40
接受家务帮助	接受每个子女家务帮助的频率的加总	2.65	2.68	0	12
提供经济支持	给所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元），取对数	2.92	3.87	0	10.82
提供家务帮助	给每个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频率的加总	3.16	2.50	0	12
看法相似性	随迁父母与每个子女看法相似性的得分的加总	8.71	4.13	1	20
人口特征					
性别	女性=0；男性=1	0.40	0.49	0	1
年龄	60 岁以下=0；60 岁及以上=1	0.43	0.50	36	88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0.81	0.39	0	1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0；初中及以上=1	0.46	0.50	0	1
收入水平	自调查时点算起过去 12 个月内父母总收入（元），取对数	6.86	4.22	0	13.60
功能状况	通过基本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调查得到的总分	11.84	0.59	8	12
随迁特征					
随迁时长	随迁父母随子女已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年）	7.74	6.57	1	30

（三）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本文将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家庭代际关系变量、人口特征变量及随迁特征变量三类。基于此，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函数可表述为：

$$Y = f(X_1, X_2, X_3) + \xi_i \quad (1)$$

(1) 式中， Y 表示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状况，包括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 2 个变量； X_1 、 X_2 、 X_3 分别代表上述三类可能影响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变量； ξ_i 是随机扰动项。由于 2 个因变量均是连续变量，本文将采用 OLS 估计方法分析相关因素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

四、结果及分析

本文分别构建 2 个 OLS 回归方程对农村随迁父母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程 1 和方程 3 分别考察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时家庭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程 2 和方程 4 引入了控制变量，反映在控制随迁父母人口特征和随迁特征的影响后，家庭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5）显示，4 个回归方程的 F 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均

小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即 0.05, 说明自变量全体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皆可建立线性模型。通过对比引入控制变量与否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 (见表 5), 发现提供经济支持对随迁父母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变得显著, 看法相似性对随迁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变得显著, 表明家庭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显著地受随迁父母人口特征和随迁特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了以下 3 种方法: 把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状况视为有序变量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把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状况处理为虚拟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随机抽取 80% 的样本进行 OLS 回归分析。有关结果^①表明, 家庭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5 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 OLS 回归拟合结果 (N=182)

变量名称	抑郁度		生活满意度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家庭代际关系				
联系频率	-0.15	-0.05	-0.26*	-0.30*
情感亲近度	-0.23**	-0.22**	0.18*	0.23**
接受经济支持	-0.02	-0.05	0.05	0.05
接受家务帮助	-0.00	-0.04	-0.04	-0.05
提供经济支持	0.12	0.18*	-0.12	-0.17*
提供家务帮助	-0.07	-0.05	0.12	0.16
看法相似性	0.13	0.01	0.23	0.28*
人口特征				
性别 (参照组: 女性)				
男性	—	0.03	—	-0.01
年龄 (参照组: 60 岁以下)				
60 岁及以上	—	0.02	—	0.18*
婚姻状况 (参照组: 无配偶)				
有配偶	—	-0.05	—	-0.01
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 初中以下)				
初中及以上	—	-0.08	—	0.03
收入水平	—	-0.11	—	0.18*
功能状况	—	-0.19*	—	-0.00
随迁特征				
随迁时长	—	-0.16*	—	0.12
拟合优度	0.09	0.18	0.10	0.15
调整的拟合优度	0.05	0.11	0.06	0.08
F 值	2.50	2.60	2.73	2.18
p 值	0.02	0.00	0.01	0.01

注: 表中结果为标准化系数;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①限于篇幅, 此处没有报告估计结果。

方程 2 和方程 4 控制了随迁父母人口特征和随迁特征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下文分析将基于上述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展开。

1.代际联系的影响。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频率显著地降低了随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大多数研究关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代际频繁联系多是出于满足父母的各方面需求,而父母对子女的依赖(即向上流动的代际支持)会降低父母的心理福利水平(Lawrence et al., 1992)。然而,通过对比控制代际支持变量(包括接受经济支持、接受家务帮助、提供经济支持、提供家务帮助)与否的回归结果^①,可以发现,代际联系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表明代际支持并未对代际联系与随迁父母心理福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实际上,老人可能更看重代际互动的质量而非数量,与家庭成员联系的质量比联系的数量对他们的福利有更大影响(Pinquant and Sörensen, 2000)。对随迁父母来说,则更是如此。随迁父母可能每天都会与子女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往往只是涉及与同住子女的惯常交流,或是非同住子女出于义务的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成为提升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一种手段,不利于改善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状况。另外,这也可能反映了随迁父母在城市较差的社会融合状况,有限的社会交往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寻求与子女更加频繁联系的方式来减缓心理压力。

2.代际情感的影响。以情感亲近度测量的代际情感显著地降低了随迁父母的抑郁度,提升了随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反映出家庭情感关系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结果与 Zhang and Yu (1998) 关于家庭情感关系对中国老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的发现相一致,也与以往西方相关研究的发现相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受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开始变得较少受孝道规范与赡养责任的约束,而情感对家庭凝聚力和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变得更为重要(Lowenstein et al., 2007)。同时,老人对其子女履行孝道责任的期待也已经从物质支持和日常照料帮助转向满足情感需求(Cheng and Chan, 2006)。由此看来,在推进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代际情感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维系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崔焱、靳小怡, 2015)。

3.代际支持的影响。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虽然中国已经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广泛覆盖,但是,较低的保障水平还远不能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子女赡养仍是中国老人的主要经济保障(Gu et al., 1995)。长期离开家乡、游离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随迁父母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排斥,难以享受到流入地的社会保障福利,他们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并没有减少,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量是他们所提供的经济支持量的将近 3 倍。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无疑会增加随迁父母的经济压力从而降低其心理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子女特别是同住的作为农民工的子女需要随迁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也可能是农民工在经济层面未能很好融入城市社会的反映。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可能严重地阻碍了农民工实现经济融入和经济自立,这同样会增加随迁父母的心理负担。

4.代际共识的影响。以看法相似性测量的代际共识显著地提升了随迁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进入城市后,父母和子女都处于文化适应的过程之中(Vedder et al., 2009),但是,他们不必然地拥有共同的经历。虽然随迁父母倾向于维持传统观念,但是,他们的农民工子女显然与城市主流社会有更

^①以心理福利(抑郁度和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先后构建包括“代际支持”变量(接受经济支持、接受家务帮助、提供经济支持、提供家务帮助)和不包括“代际支持”变量的两个方程,通过比较这两个方程回归结果中“代际联系”变量系数的变动情况,可以考察“代际支持”是否对“代际联系”与随迁父母心理福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限于篇幅,此处没有报告具体估计结果。

多的联系，并由此具有更高的融入城市水平。同时，根据发展老龄化理论（developmental aging theory），在跨越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父母和子女在家庭代际互动上有不同的投入和权力来源（Bengtson and Kuypers, 1971）。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获得与父母类似的社会地位；而逐渐进入老年阶段的父母所掌握的资源和社会权力减少，其价值观念开始更多地受子女影响（Glass et al., 1986）。对于随迁父母而言，他们的农民工子女接受了更多的城市生活观念，代际看法相似可能意味着随迁父母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这有助于改善其生活满意度。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索性地分析了家庭代际关系（包括代际联系、代际情感、代际支持和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第一，代际联系频率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意味着代际联系的质量和随迁父母自身的城市社会融入情况对其心理福利更为重要；第二，类似于西方家庭，情感关系成为中国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不利于提高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水平；第四，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随迁父母与子女一同融入城市社会有助于提升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反映出，在迁移带来家庭生计与生活场域剧烈变动的压力情境下，良好的家庭关系和较高的代际团结水平是流动人口家庭抵抗外界风险的重要支撑。农村父母以照料孙子女为主要随迁目的的现实使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家庭”代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代际互助与互惠”，这为提高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水平乃至整体生活福利水平提供了条件，缓解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颓势。本文对代际团结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应用尝试，是该理论在中国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研究上的有益探索。本文所做的研究表明，代际团结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和心理福利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呈现较高的代际团结水平和较强的家庭凝聚力，代际团结与随迁父母心理福利之间较强的关联反映出家庭对提升个人福利具有重要作用，代际团结是增进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条件。提高城市“新移民家庭”的福利水平是流动人口从“半城市化”状态转变为“完全城市化”状态的基础。在“新常态”背景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建立普惠性的家庭基础福利制度；在农村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下，有必要将包括随迁父母在内的城市“新移民家庭”同时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框架内，实现随迁父母异地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为包括随迁父母在内的城市“新移民家庭”融入城市社会创造平等友善的政策环境。其次，家庭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可能存在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城市社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弥补家庭对父母关怀的不足。在社区建设中，应加强对传统孝道责任的宣传和对新的代际支持模式的倡导，促进农民工对随迁父母的孝行实践和情感关怀；通过搭建社区活动平台、组织社区活动，改善随迁父母在当地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融合状况；组织志愿者关怀有困难的随迁父母，减少随迁父母给作为农民工的子女提供家庭照料的现实压力，疏解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压力。最后，由于代际共识的达成有赖于随迁父母与子女一同融入城市社会，提高包括随迁父母在内的“新移民家庭”的城市社会融入水平，有利于改善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状况。政府在制定家庭、就业、社会保障与文化等方面政策时，应保障“新移民家庭”平等地享受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水平，并应以此为基础，通过社区建设，促进随迁父母融入城市社区，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关注代际情感关系的维护与代际互动质量的提升，从而加强“新移民家庭”的养老功能，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状况。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受《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关于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加强就地就近城镇化这一政策利好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农村随迁父母群体的规模将日益扩大。本文所用样本来自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关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目前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在未来出现大规模农村随迁父母群体时,这类“新移民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影响的规律,从而为这些地区提早做好相应的政策安排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研究重点和样本规模,在模型中未能加入更多变量。尽管家庭是农村随迁父母在城市的主要活动场所,但是,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与来自社区的社会支持也会影响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同时,子女特征会影响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考虑这些变量的影响。其次,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在乡城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显示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特别是在面对迁移这样的压力事件时,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可能出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这显然会给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代际冲突和矛盾的影响。最后,随迁父母由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家庭关系将有别于仍然居住在农村的父母与城市户籍父母,对这三类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对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崔焯、靳小怡:《亲近还是疏离?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人口研究》2015年第3期。
- 2.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年。
- 3.靳小怡、崔焯、郭秋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人口学刊》2015年第1期。
- 4.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 5.李越、崔红志:《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4期。
- 6.宁玉梅:《进城老人的社会排斥与整合社工介入探讨》,《学理论》2013年第27期。
- 7.任强、唐启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4期。
- 8.宋璐、李树茁、张文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年第11期。
- 9.宋璐、李亮、李树茁:《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2期。
- 10.王萍、左冬梅:《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6期。
- 11.姚兆余、王鑫:《城市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社会工作》2010年第18期。
- 12.易丹:《随迁老人:一个亟需社会关注的群体》,《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 13.余昆:《关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文献综述》,《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年第4期。
- 14.张文娟、李树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5期。
- 15.张旭升、林卡:《“成功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含义》,《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 16.Bengtson, V. L. and Kuypers, J. A.: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k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4): 249-260, 1971.
- 17.Bengtson, V. L. and Roberts, R. E. 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4): 856-870, 1991.
18. Bengtson, V. L. and Schrader, S. S.: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Mangen, D. and Peterson, W.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Vol. 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19. Chen, X. and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22(1): 43-65, 2000.
20. Cheng, S. T. and Chan, A. C. M.: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5): 262-269, 2006.
21. Comidis, I. A. and McMullin, J. A.: To Have or Have Not: Parent Status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Men and Women, *The Gerontologist*, 33(5): 630-636, 1993.
22. Diener, E. D.; Emmons, R. A.; Larsen, R. J. and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1985.
23. Edwards, J. N. and Klemmack, D. 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 Re-examin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8(4): 497-502, 1973.
24. Freund, A. M. and Baltes, P. B.: Selection, 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as Strategies of Life Management: Correlations with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Successful Ag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13(4): 531-543, 1998.
25. Giarrusso, R.; Stallings, M. and Bengtson, V. L.: The Intergenerational Stake Hypothesis Revisited: Parent-child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20 Years Later, in Bengtson, V. L.; Schaie, K. W. and Burton, L. M. (eds.): *Adul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ffects of Social Change*,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95.
26. Glass, J.; Bengtson, V. L. and Dunham, C. C.: Attitude Similarity in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Socialization, Status Inheritance, or Reciprocal Influ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685-698, 1986.
27. Gu, S.; Zhu, N.; Chen, X. and Liang, J.: Old-age Support System 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4(2): 245-273, 1995.
28. Hogerbrugge, M. J. A. and Komter, A. E.: Solidarity and Ambivalence: Comparing Two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Using Longitudinal Panel Data,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3): 372-383, 2012.
29. Katz, R.: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A Cross-national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6(2): 79-90, 2009.
30. Katz, S.; Ford, A. B.; Moskowitz, R. W.; Jackson, B. A. and Jaffe, M. W.: Studies of Illness in the Aged: The Index of ADL: A Standardized Measure of 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 *Jama*, 185(12): 914-919, 1963.
31. Katz, R. and Lowenstein, A.: Adjustment of Older Soviet Im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Residing in Shared Households: An Intergenerational Comparison, *Family Relations*, 48(1): 43-50, 1999.
32. Lawrence, R. H.; Bennett, J. M. and Markides, K. S.: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Older Mex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7(2): S55-S65, 1992.
33. Lee, G. R.: Kinship and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geing and Society*, 5(1): 19-38, 1985.
34. Lee, G. R. and Ellithorpe, 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1): 217-224, 1982.
35. Lin, J. P.; Chang, T. F. and Huang, C. 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Wome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S1): S47-S58, 2011.
36. Lowenstein, A. and Katz, R.: Living Arrangements, Family Solidar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wo Generations of

- Immigrants in Israel, *Ageing and Society*, 25(5): 749-767, 2005.
37. Lowenstein, A.; Katz, R. and Gur-Yaish, N.: Reciprocity in Parent-child Exchang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3(4): 865-883, 2007.
38. Markides, K. S. and Krause, 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Mexican Americans: A Three-generations Stud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0(3): 390-392, 1985.
39. McCamish-Svensson, C.; Samuelsson, G.; Hagberg, B.; Svensson, T. and Dehlin, O.: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as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Advanced Old Age: Results from a Swedish Longitudinal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48(4): 301-324, 1999.
40. Pinquart, M. and Sörensen, S.: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 and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15(2): 187-224, 2000.
41. Radloff, L. 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3): 385-401, 1977.
42. Roberts, R. E. L. and Bengtson, V. L.: Is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 Unidimensional Construct? A Second Test of a Formal Model,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5(1): S12-S20, 1990.
43. Roberts, R. E. L.; Richards, L. N. and Bengtson, V.: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Families: Untangling the Ties that Bind,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16(1-2): 11-46, 1991.
44. Rossi, A. S. and Rossi, P. H.: *Of Human Bonding: Parent Child Relation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45. Shuval, J. T.: Migration and Stress, in Goldberger, L. and Breznitz, S. (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Free Press, New York, 1993.
46. Silverstein, M. and Bengtson, V. L.: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The Contingencies of Declining Health and Widowhoo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8(7): 943-957, 1994.
47. Silverstein, M. and Bengtson, V. L.: Do Close Parent-child Relations Reduce the Mortality Risk of Older Par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2(4): 382-395, 1991.
48. Silverstein, M.; Chen, X. and Heller, K.: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4): 970-982, 1996.
49. Silverstein, M.; Cong, Z. and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5): S256-S266, 2006.
50. Vedder, P.; Berry, J.; Sabatier, C. and Sam, 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alues in National and Immigrant Families: The Role of Zeitgeis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5): 642-653, 2009.
51. Zhang, A. Y.; Lucy, C. Y.; Yuan, J.; Tong, Z.; Yang, C. and Foreman, S. E.: Family and Cultural Correlates of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Eld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43(3): 199-212, 1997.
52. Zhang, A. Y. and Yu, L. C.: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Elderly in Beiji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3(2): 109-125, 1998.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薇 洛)